

# 朱子学研究

邹永贤主编



75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朱子学研究

邹永贤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5.

# 朱子学研究

邹永贤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8.625印张 2插页 206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615-0093-9

B·5 定价：3.30元

##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们近年来研究朱子学所写的一部分论文的集子。我们以它的初稿参加了“中国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广泛征求了意见。

朱子学又称为闽学，创始人朱熹。濂、洛、关、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四大派。而闽学创建于后，吸收、继承了前面各派的思想，所以又是集宋代理学的大成的学派。关于朱熹理学，朱熹本人的哲学思想，历史上研究的人已很多。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又作了大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底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探讨：〈一〉朱子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建立、发展、衰颓以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全过程。特别是朱熹在福建的后学，在朱熹死后、乃至在朱子学已经把其影响扩至全国，成为官方哲学后，如何推动朱子学发展，以及福建朱子学在福建发展的全过程。这种研究，从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是一种解剖麻雀式的工作，如果能取得成果，无疑对深入认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是有益处的。〈二〉朱子学派思想发展的专题研究，尤其是他们如何把理学思想应用到政治、教育、道德修养等等领域的研究。〈三〉朱子学派的影响，包括国内、国际的影响。特别着重考察它在福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文化、以至于民情风俗都很深远，直至现在尚不能忽视，值得分专题深入研究，我们之所以着重研究这三方面的问题，是既考虑了这种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又考虑了我们在福建工作的特殊的、在某些方面又是有利的条件的结果。很明

显，这三个方面是互有联系的，它代表我们这一个时期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方向。这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就是这个研究方向的第一批的一部分成果。其中《闽学概说》；《朱子学的发展阶段及其派别》；《杨时道南开闽学之先河》；《朱熹理学启蒙师李侗的思想》；等篇是属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的论文。《朱熹的两一思想及其衍化》；《朱子学派治国纲领试探——兼析真德秀〈大学衍义〉》；《清初的朱子学及其历史的反思》等篇是属于第二个方面的论文。《真西山的〈心经〉是李退溪心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动向》等篇则属于第三方面的论文。可见，这些论文的写作和选集都不是任意的。它们服从于同一个研究方向的要求，互相配合共同组成了一个逻辑体系。这个工作还仅仅是开始，我们今后还当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它。

在编辑时，我们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在学术问题上不强求观点的一致。只要言之成理，即使与主编的观点不一致，也予保留。我们认为在一本论文集性质的书中，论文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论点，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可能还有利于读者比较。在比较中思考，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

我们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有些领域，前此研究者还比较少，可资借鉴的资料也较少，加上我们自己的水平低，错误就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邹永贤

1987年11月5日

# 目 录

## 前言

<b>一、朱子学（闽学）的建立和发展</b> .....	( 1 )
闽学概说.....	高令印 ( 2 )
朱子学的发展阶段及其派别.....	陈其芳 ( 16 )
杨时道南开闽学之先河.....	何乃川 ( 54 )
罗从彦及其道统论思想.....	何乃川 ( 68 )
朱熹理学启蒙师李侗的思想.....	何乃川 ( 76 )
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与闽学辨析.....	高令印 ( 101 )
<b>二、朱子学专题研究</b> .....	( 110 )
朱熹的两一思想及其衍化.....	邹永贤 ( 111 )
朱子学派治国纲领试探 ——兼析真德秀《大学衍义》.....	邹永贤 ( 158 )
清初朱子学及其历史的反思.....	孙明章 ( 201 )
<b>三、朱子学派的国际影响</b> .....	( 240 )
真西山的《心经》是李退溪心学思想的理论 渊源.....	高令印 ( 241 )
朱子学在新加坡和泰国的传播和影响.....	高令印 ( 254 )
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动向.....	高令印 ( 260 )

# 一、朱子学（闽学）的建立和发展

编者按：

这个项目共收了六篇文章。其中《杨时道南开闽学之先河》，《罗从彦及其道统论思想》，《朱熹理学启蒙师李侗的思想》，《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与闽学辨析》是关于朱子学的思想渊源的研究。《闽学概说》和《朱子学的发展阶段及其派别》则是关于闽学建立和发展的总情况的介绍。学术界对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人在理学南来与闽学建立中的作用，虽大体有定论，但对他们各人的思想对朱熹的影响的估价上并未完全一致。本书提出的观点，可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关于朱熹去世后福建是否还有朱子学（闽学）的新发展？朱子学的历史发展究竟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以什么标准来划分阶段？朱子学在中国究竟何时算“终结”？朱熹以后朱子学派内部又是怎样分化的？这些问题学术界尤其存在不同的认识，就是本书的作者们的看法也不一致。这里所提出的观点，仅代表文章作者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研究成果提出来，也许对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会有所裨益。

# 闽学概说

高令印

在历史上，一般把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福建朱子学派称为闽学。朱熹之后，闽学思想发展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并影响日本、朝鲜等国思想文化数百年，近代又传入西方，成为世界性的学说。学者们颇为忽视的问题是：当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思想超出福建范围具有全国以至世界意义后，它的故乡福建还有否闽学？如果有，朱熹之后的闽学是怎样发展的？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旨在引起学者们对闽学的注意。

## 一 闽学是宋元明清时代闽中之理学

闽学产生于南宋时的福建，是地域性的学派。今人张岱年说：“朱熹的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闽学与北宋的濂、洛、关之学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朱熹生存时期，经常与江西陆九渊的‘心学’、浙江陈亮的‘功利’之学进行辩论。学派的划分与地域有一定的关系，福建地区是朱学的根据地。”（陈其芳等《福建朱子学·序言》第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在宋代诸学派中，以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和福建建阳考亭朱熹的闽学最为著名。福建古称为闽中或闽。把朱熹的学说称为闽

学，是因为朱熹生卒和居住于福建，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并著述、讲学于福建，在福建形成成为强大的朱子学派。清人蒋垣说：“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南平）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为闽。盖不忘道统所自。”（《八闽理学源流》卷一）

“不忘道统所自”，就是从朱熹的思想渊源和形成过程的意义上来讲的。闽学发端于南宋初年福建理学家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人，朱熹通过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严密的思想体系。蒋垣又说：“濂溪周子敦颐，继孔孟绝学于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伯子颢、叔子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麟、谢佐良、游酢、张绎、苏炳、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著。杨时，闽之将乐人。……杨时归闽，受业者多，东南推其程门正宗，遂为八闽理学之始。门人胡宏、罗从彦尤著。宏传之张栻，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同上）清人熊赐履说：“东南学者推先生（按指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文定公往来讲学尤多，胡五峰、罗仲素皆其弟子。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文公张宣公之学得程氏正宗。其源委脉络皆出于先生。”（《学统》卷二三《翼统·杨龟山先生》）可见清代学者一般是把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作为闽学形成的传授系統的。

朱熹之后，福建朱子学者对闽学思想体系作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清人陈衍锟说：“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按指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按指真德秀，南宋末浦城人）。又二百余年，而剩夫陈氏（按指陈真晟，明朝漳浦人）、翠渠周氏（按指周瑛，明朝莆田人）、虚斋蔡氏（按指蔡清，明朝晋江人）。向非有先生（按指吴海，元朝福州人）之辟邪崇

正，傑然挺出于絶續之間，何以繼以往而啓將來哉！”（《聞過齋序》）由于閩學和朱子學都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南宋时閩學和朱子學具有相同的意义。在元明清时代，閩學和福建朱子學也是一致的。

閩學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死后不久。明清之际的黃宗羲在讲到南宋末年学者王應麟时说：“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楊文清公為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講關、洛、濂、閩、江西之異同。”（《宋元學案》卷八五）咸淳為南宋度宗年号，其元年為1265年。此处提及閩學概念出現的时间是朱熹死后六十五年。元朝理學盛行，亦稱閩學盛行。清人蔣垣說：“姚枢（元朝廣西柳城人）隱居蘇門，以道學自任，刊《小学》、‘四書’及蔡氏《書傳》、胡氏《春秋》，而閩學至河朔矣！”（《八閩理學源流》卷一）在明代，明人陳鼎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仁為祭酒，一宗朱子之學。今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東林列傳》卷二《高攀龍傳》）到了清代，張伯行編輯《濂洛關閩書》十九卷，開閩學研究之風；清代學者認為，閩學“獨標性命之旨”，“即閩學亦理學，亦儒學”。

由上可见，閩學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主要門人和宋元明清时代福建主要理学家的思想。因此，閩學不是历史上一般閩中之學，而是宋元明清时代閩中之理學，它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理學思潮相关联，共始终。閩學是理學在福建发展的一个主要派別，它有自己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

辨明閩學不只是朱熹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宋元明清时代閩中之理學，这是研究閩學的前提。閩學之所以不被學者所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朱熹思想和閩學思想等同起来，认为在朱熹学说之外无所谓閩學。这样，既然详细地研究了朱熹及其学说，

就无须研究闽学了。因此，在近代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和有关论著中，大多在较详细地论述了朱熹思想之后，接下就论述和朱熹相对立的哲学家，不再论及朱子学家，因而看不出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正宗思想的朱子学的发展线索和规律。其实，就福建而论，从南宋至清末，朱子学者亦即闽学学者，代代有人，一脉相承，逐步提高，在完善和充实朱子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朱熹思想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后，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逐步衰落，它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消极和反动，其后继者的思想基本上是在朱熹思想体系的范围内兜圈子，没有多少新的境界可辟。但是，闽学（福建朱子学）却与其有很大的不同。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唐末五代以来，各种战乱“福建幸未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文化。”（《顾颉刚致胡适之的信》，见《胡适之日记》上册第290页）到了宋代，福建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据明初虞集所记，北宋末南宋初，“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极至四海”（《郑氏诗传序》）。当时，福建为全国印刷业的中心。印刷业发达是文化兴盛的标志。在宋辽金元明清六朝中有三朝是非汉族入主中原，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不愿为异族服务，退居福建隐居。在闽学学者中，除了李光地等部分人高官厚禄外，大多隐居不任或仕途失意，主要精力从事于朱子学的研究。他们对朱子学的主要范畴，如理气、道器、一多、理欲、格物穷理等都有不同程度地探讨，完善和充实了这些范畴的内容。他们中不少人不是为科举仕途而学，治学超出朱熹《四书集注》的范围，开辟了朱子学研究的新领域，因而闽学学者有了新的思想境界。朱熹之后的闽学学者在伦理学、格物践履等方面突出地、全面地发展了朱子学，如黄干的体用论、陈淳的知行论、真德秀的性情说、熊禾的全体大用论、吴海的气节论、陈真崖的

心学图、蔡清的虚静论、陈琛的学以至仁说、林希元的依可而行论、蔡世远的志气说、陈庶煥的好善论等，大多为朱熹言而未详而详之，或为朱熹之后的新论说。他们不空谈心性，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和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官有较好的政绩，在籍为乡里办事，被尊为贤哲。

闽学是宋明理学思潮中必然产生于闽中的一个主要派别，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研究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朱子学，必须研究闽学。只有研究闽学，才能弄清理学、朱子学的源和流，看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正宗思想发展的各种具体形态和特殊方式，从而展现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丰富多姿、别具风格的灿烂光辉。

## 二 闽学的发展阶段

上面对朱熹之后福建还有否闽学等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闽学的发展过程就成为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经初步研究，闽学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重要阶段。

### （一）南宋末至明代中叶闽学的繁盛

朱熹死后不久，基于封建王朝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应闽学学者刘爚（建阳人）等人的请求，党禁解除，恢复了朱熹的名誉。此后，朱熹的头衔忽剧加高，其学说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于是，闽学学者更加活跃，闽学发展有不可遏止之势。不过，直到南宋末年，其传播和影响仍仅限于闽浙地区。

宋末元初，闽学学者黄干（闽县人）、熊禾（建阳人），以及许衡（河南沁阳人）等，极力传播朱子学，致使闽学由福建而全国。后由朝廷诏令国家考试以朱熹所订“四书”出题，诠释亦

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因而朱子学全国大昌。但是，大多数闽学学者基于其道德践履和务实精神，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到朝廷做官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像熊禾、陈普（宁德人）、邱葵（同安人）在南宋末年曾任地方官，入元后朝廷几召不出，甘受贫困。郑仪孙（建瓯人）隐居山林不仕。敖继公（长乐人）中进士后归里务农。吴海生活在元末，也未曾出来做官。有的还进行反抗活动。此外，元代闽学学者知名的还有宁德人韩信同、陈自新，长乐人欧阳光、郭陞，邵武人黄镇成、黄清老，莆田人陈旅、刘有定，建瓯人张复、雷抗，龙溪人林发，等等。元代闽学学者人材济济，有的学术成就不亚于居全国地位的许衡、吴澄（江西抚州人）等。但由于他们和朝廷对立，得不到朝廷的褒扬，有的还受到朝廷的攻击和诬蔑，因而不居全国地位。

对元代闽学学者的学术特点，明人朱衡在评论吴海时说：“元吴朝宗（按即吴海），……善守朱门户，不为异说所惑，有传道之功。”（《道南源委·凡例》）他们凡朱熹“明体达用之学，修己治人之术，无不一体验于身心之间”（清张伯行《闻过斋序》）。

到了明代，科举考试仍以朱子学为准。在明代前期，闽学极为盛行。当时知名闽学学者有陈真晟、蔡清、周瑛等。清人雷𬭎说：“吾闽自有宋诸大儒，后代有传人，明中叶如陈剽夫、蔡虚斋，确守朱子，以津梁后学。”（《经笥堂文钞·童寒泉志铭》）清人张伯行说：“道南一脉，代代有传人。……陈剽夫、周翠渠诸先生，皆卓然有立，增辉宇宙。”（《鹿洲初集·旧序》）陈真晟著有《程朱正学纂要》、《正教正考会通》等。他认为，“未有能致知不用敬者”（《陈剽夫文集·答周公载》），诚心诚意专于人伦道德之规范，心中常存“三纲五常”，就是“主敬”。他说：“敬而主于一，则静有所养，而妄念不复作矣；动而主于

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能夺矣！”（《程朱正学纂要》）陈真晟的思想为其门人周瑛进一步阐发。周瑛说：“学者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读蜀阜存稿私记》）蔡清认为，理是外在的，通过穷理能得之。蔡清关于理的思想比陈真晟、周瑛高出一筹。总之，明代前期闽学学者对朱熹的伦理学和认识论有较多的阐发。

## （二）明代后期王学盛行，闽学独撑朱学门户

明代到世宗嘉靖年间，盛极而衰，转入后期。当时，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具有启蒙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他们企图从朱子学的一统天下的禁锢中跳出来。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的学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极力攻击朱子学，使朱子学一时低落。

在福建传播王阳明学说最力者首推耿定向（湖北黄安人）。他在明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他在福建开办学堂，教授门徒，宣扬王学。他认为，心即道，即事即心；良知为现现成成，无入不备。他使王学在福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李贽（泉州人）在《藏书》中指责著名闽学学者蔡清、陈琛、张岳、林希元（后三人皆泉州人）等为迂狂不通。

明代中叶以前，闽学和全国朱子学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后，在王学的攻击下，全国朱子学急趋下坡，而闽学却仍十分盛行，并在与王学辩论中有所发展。清人李光地曰：“时姚江（按指王阳明）之学大行于江南，而闽士莫之尊，其挂阳明弟子者闽无一人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谈之所能夺。”（《重修文庄蔡先生祠记》）清人陈科捷亦谓“吾闽人士仍守朱子家法，终明世无为王氏学者”（《紫峰文集序》）。当时，闽学学者奋起与王学对抗。李光地又说：“吾闽僻在天末，然自晦庵朱子以来，道学之正为海内宗。至于明兴科名，与

吴越争雄焉。”（《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与吴越争雄”，就是闽学学者批判和抵制王学，捍卫朱子学。例如，马森（候官人）提出，理学必须以朱学为宗，王学非理学之脉；卢一诚（福清人）坚持朱子学立场，拒绝参加王阳明学社；童世坚（连城人）初受业于王阳明，归里后笃信朱子学，谓王学不若朱学有把握；杨应诏（建阳人）与王学学者王心斋、王龙溪反复辩论，抨击王学，等等。

明代后期最有代表性的闽学学者为陈琛、张岳、林希元。他们同郡（泉州）、同年（同榜进士），志趣学识相同，互以道义相许。明人郭棐在讲到张岳时说：“公丁丑榜进士，与陈琛、林希元同志究心性理学，以程朱为宗，时目为泉州三狂。”（《粤大记》）明人蔡献臣说：“明正德丁丑榜，吾泉最号得人，学献公琛，襄惠公岳，而大理寺丞次崖林公希元也。三先生皆邃于经学，以文章气节名一时，而作用不同，际遇亦异，其为学士所宗，而称我闽人物第一流则一。”（《林次崖先生文集序》）他们三人是继明代前期蔡清等人之后，是明代后期最有成就的闽学学者。清人李光地说：“自明兴以来，尽心于朱子之学者虚斋蔡先生一人而已。自时厥后，紫峰陈先生、净峰张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开启授学而私淑焉。泉州经学遂蔚然成一家言。”（《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他们三人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闽学学术派别。

明代有名的著作“三易”，就是指蔡清的《易学蒙引》，陈琛的《易学通典》，林希元的《易学存疑》。这三部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朱子学易论水平。此外，他们还有“三书”，即蔡清的《四书蒙引》，陈琛的《四书浅说》，林希元的《四书存疑》，也是当时有名的著作。清人雷鋐说：“前明中叶，姚江大昌心学，吾闽恪守程朱，以有蔡虚斋先生持之，而林次崖与陈紫峰两

先生继之，《蒙引》、《浅说》、《存疑》三书，久以衣被天下。”（《经笥堂文钞·林次崖先生文集序》）这三部书全是对朱熹《四书集注》的阐发。

对于陈琛、张岳、林希元在明代闽学以至全国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们各自的学术特点，清人陈科捷有比较概括的说明。他说：“学术、事功出于一原，固不容歧而二之也。吾泉多实学。……明之中叶，有虚斋蔡文庄公出，尽心正学，蔚为一代儒者之宗。陈、林、张、史（笥江）四先生继之，道以大明。然惟紫峰先生独亲受业于虚斋，引为畏友。诸先生皆所谓私淑斯人者也。次崖之《四书》《易经》‘存疑’，与虚斋之《蒙引》、紫峰之《浅说》《通典》，并为学者所尊尚。而限于位，欲有所建立而不能。……净峰著有边功，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今读其书，亦可以见其体用之所存。”（《紫峰文集序》）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明代闽学有比较严密的学派系统。

### （三）清代闽学的复兴和终结

清朝建立后，满清贵族统治者慑于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作出不少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他们在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领域实行高压和利用相结合的政策。清圣祖康熙皇帝叫闽学学者李光地（安溪人）主编《朱子大全》等书，用朱子学统一天下言论和思想。此时，王学末流极为空疏和妄诞，在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影响下，提出“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满街皆是圣人”等命题，夸大主观的作用，成为狂禅。清人陆陇其说：“学术坏而风气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之作矣！”（《三鱼文集·学术辨上》）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大都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王学末流的腐败学风。清人李元度说：“论者谓明之灭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意以此归

罪于阳明。”（《先正事略》卷三）当时，大多数学者感到王学非抛弃不可。清初王学盛而复衰，朱学衰而复盛，是势所必然。

清初朝廷大力提倡闽学。康熙皇帝与李光地谈《易》辄至深夜。乾隆皇帝称福建为理学之乡。特别是，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期间，提倡闽学不遗余力，他编辑出版了几十种闽学著作。他设立鳌峰书院等，聘请著名闽学家为院主和教授，培养了大批闽学学者。清人陈庚煥说：“仪封（按指张伯行）抚闽倡兴实学，九郡（按清代福建分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汀州、建州、延平、邵武、漳州九郡）之士翕然成风。……自宋以来，闽士蔚兴，与中州埒。道南一脉，远绍洙泗。举濂、洛、关之统，悉荟萃于闽，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惕园初稿·拟重修福州文庙碑》）

清初主要闽学学者有蔡世远（漳浦人）、兰鼎元（泉州人）、李光地等，被称为“闽学复兴”（同上）者。近人梁启超说：“福建朱晦翁侨寓地也，宋以来称闽学焉。……康熙间，则安溪李晋卿光地善伺人主意，以程朱道统自任，亦治礼学、历算等，以此跻身高位，而世亦以大儒称之。……雍正间，则漳浦蔡闻之世远，亦以程朱学闻于时。”（《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

清代至乾嘉时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采取高压政策。近人王缩尘说：“满清异族入主中原，大兴文字之狱，士大夫对于义理政治噤若寒蝉。清廷复大开博学鸿词科，收罗英俊之士。而所谓汉学者，遂由此而产生焉。”（《汉学师承记·评序》）一些学者为回避现实，致力于经籍上的考据，出现只搞文物训诂的汉学学风的复兴，形成了所谓汉学学派。当时，汉学是作为宋学（宋明理学的总称，主要指朱子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朱子学控制中国思想文化达五六百年，其空疏武断的弱点更加露骨，全国第一流学者大多治汉学，朱子学自然低沉。

在汉学几成一尊之局的乾嘉时代，闽学学者仍守朱子学残